

·文献学苑·

战国楚简的发现和《礼记》研究的反思

王 鐸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发现和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竹书的公布,轰动了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这批楚简,与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和道家《老子》等文献,关系最为密切,从而引发对两千年《礼记》研究的反思。文章从《礼记》研究存在的问题、《礼记》的真伪、《礼记》与秦汉学者的关系、《礼记》研究的意义等四个方面,探讨《礼记》研究的现状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礼记》不存在真伪问题,主要是四十六篇成篇年代先后的问题。四十六篇中的大多数和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都是先秦之作。秦汉学者在四十六篇的流传和整理中,功劳卓著。戴圣将《曲礼》等四十六篇编成《礼记》,后经郑玄等人的注解,基本奠定了《礼记》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郭店楚简 上博简 礼记 戴圣 礼学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3-0124-08

The Discovery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u Bamboo Slips And The Review of Studying Liji

Wang 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Guodian Chu bamboo slips of Jingmen town Hubei province and the promulgation of Chu bamboo books of Shanghai museum, cause a sensation in China and even World. These bamboo slips arouse the review of studying Liji on two thousand years for them concerned Shijing, Liji and Laozi.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actuality of studying Liji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e problems on studying Liji, genuine or phony of Lij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ji and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s schola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Liji. There is only problems of writing time of 46 chapters but no problem such as genuine or phony of Liji. Most of the 46 chapters and the main parts of the other chapters were written Xian Qin. The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s scholars acquired a brilliant achievement in their copying and tidying. Dai Sheng had edited 46 chapters as Liji, and then Zheng Xuan annotated it. By and large, this established the academe and politics status of Liji, and have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Guodian Chu bamboo slips; Chu bamboo books of Shanghai museum; Liji; Dai Sheng; studying Liji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3-0124-08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的战国时期一号楚墓中,出土了八百余枚楚国竹简,经整理,可

分为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两部分,道家著作有《老子》三篇(甲、乙、丙)、《太一生水》一篇,儒家著作有《缁衣》、《鲁

收稿日期 2005-11-03,责任编辑 党燕妮

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四篇。郭店楚简图版和释文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名《郭店楚墓竹简》。该书出版后,轰动了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关于郭店楚简的学术研讨会和论文,“铺天盖地”,热闹非凡。稍加翻检《郭店楚简研究》^[1]、《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等书和相关刊物,即可感受一二。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到1200余枚战国时期楚国竹简,经专家整理,于2001年11月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书名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经出版四册,包括《孔子诗论》、《缙衣》、《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中弓》、《恒先》、《彭祖》、《采凤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二十多篇。这批战国楚竹书的公布,又一次在学术界掀起研究热潮。相关研究论文已经结集出版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4]等。

郭店简和已经公布的上博简中《缙衣》篇两件,与《礼记·缙衣》内容一致;上博简《民之父母》,基本同于《礼记·孔子闲居》;其他篇章《性自命出》、《六德》、《内礼》等,均与《礼记·乐记》、《丧服四制》、《内则》等密切相关,从而引发我们对《礼记》研究的反思。利用这些文献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重新考察《礼记》四十六篇的成篇年代、《礼记》的编选成书及《礼记》四十六篇在儒家思想传承过程中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是一部孔子弟子及其后学者论述先秦礼制的学术论文集。^[5]①自西汉末期编选完成,尤其是郑玄作“注”以后,地位日益上升,唐代取得“经”的地位,宋代以来,位居“三礼”之首。人们提到《四书》,必然想到《礼记》中之《大学》和《中庸》;谈到《五经》,《礼记》居其一。历代学者十分重视对《礼记》的研究,自汉代以来,中外学者研究《礼记》的专著有八百余部,论文近千篇。^[6]综观这些论著,历代学者特别重视对《礼记》经文的校勘、训诂、注音。如郑玄《礼记注》、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释文》、孔颖达《礼记正义》、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藏

《礼记集说》和清阮元《礼记校勘记》、王引之《经义述闻·礼记》、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这是《礼记》研究的主流,成绩最为突出。

毋庸讳言《礼记》研究中,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从《礼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礼记》的真伪、《礼记》与秦汉学者的关系和《礼记》研究的意义等方面,反思《礼记》研究的现状及其意义。

近两千年的《礼记》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礼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自汉至宋代《礼记》四十六篇中,只有《中庸》等八篇可以说出作者,其它三十八篇的写作年代,仅沈文倬先生作了初步的探讨,^[7]尚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大体确定产生的时代。

2、《礼记》一书的编选过程及成书时间尚无一致的说法。这与两汉时期经学的发展、戴圣生平、刘向校书等密切相关,必须进一步梳理。关键在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汉书》等的记载,搞清《礼记》的资料来源。《礼记》的资料来源,绝非古文《记》百三十一篇一种,也包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记载的一些文献,如《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等;二是搞清戴圣的生平及其师承,寻找戴圣及其弟子与《礼记》之间的关系,以便进一步确定《礼记》的编选者与编选时间。

3、《礼记》思想研究方面,由于对《礼记》各篇的写作年代没有准确的把握,导致对《礼记》思想的分析也很不够。

朱熹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它们与《论语》、《孟子》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8]

冯友兰对《礼记》中记载的儒家婚、丧、祭礼之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学》、《祭义》、《学记》、《中庸》、《礼运》等篇阐述的思想,显然是继承了孟子、荀子的思想。^[9]

当今仍有人把《礼记》中一些篇章放到秦汉时期来讨

①梁启超、吴承仕认为《礼记》是一部丛书。梁启超说:“《礼记》为儒家者流一大丛书。”见《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第88页。吴承仕说:“以近世书部相况,则《记》百三十一篇者,犹稍古之丛书,其中篇目容与他单行书、他丛书有复重者。二戴之《记》则犹晚出之丛书,其所采会即本之稍古之丛书,并删取各家单行之书,以自成一部,而二家所录自不嫌互有异同也。”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04页。

论,如张少康、卢永瞢先生编选的《先秦两汉文论选》说:

《礼记》一书,为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卒于公元前130年)所得之先秦古籍中的一种。据说刘德所得《礼记》共为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删改编定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德兄子戴圣又删改编定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礼记》内容显然是经过刘德等人整理加工的,其中《乐记》一篇,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说,为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10]后《隋书·音乐志》记载,沈约曾说“《乐记》取《公孙尼子》”,但也未有其他证据。然而由此可见《礼记》内容是汉儒加工编定的,有些可能就是汉儒的发挥了,而其中所引孔子的话,自然也是不可靠的。不过,我们可以把《礼记》看作是汉儒对先秦儒家思想学说所作的一部分总结。^[11]

《六艺略》记载:“《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并曰:“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班固所言,很明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刘德与毛生等人所作《乐记》即后来王定、王禹所传之《王禹记》二十四篇,所献八佾之舞与汉初制氏所记“铿锵鼓舞”相近;二是刘向校书所得《乐记》二十三篇,并非刘德等人所作,乃内府所藏。张少康等先生将内府所藏《乐记》二十三篇与刘德和毛生等所作、王禹所传《王禹记》二十四篇混而为一,故认为《乐记》二十三篇是刘德等人“整理加工的”,然后进一步推断《礼记》是汉儒加工编定,有些甚至是汉儒的发挥,最后,将整个《礼记》看作是汉儒对先秦儒家思想学说所作的一部分总结。”并将其时代定为汉代,这种论证和结论值得商榷。

龚建平以《祭义》、《礼运》、《礼器》、《王制》、《祭法》、《祭统》、《丧大记》、《乐记》、《中庸》、《大学》、《哀公问》为主,探讨了礼的意义、儒家的天道观和宇宙观、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等哲学思想。较之以前对《礼记》思想的研究,深入很多。但将许多篇目,从思想角度,定位在秦汉,尚需探讨。^[12]

4.《礼记》文体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谈先秦文体的论著,几乎都没有注意到《礼记》文体的特征及其分类。最新

的《先秦文学史》说:“《礼记》大多是议论文和说明文,只有《檀弓》篇具有故事情节。”^[13]这种看法太笼统。该书仅对《檀弓》一篇中“苛政猛于虎”、“曾子易箦”、“不食嗟来之食”、“杜蕢扬觶”几则故事进行了分析,对《礼运》、《中庸》、《大学》、《学记》、《乐记》几篇论说文的特点,作了简要分析,其余均阙如。可见,对《礼记》的散文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研究,非常薄弱。

吕思勉先生曾说:

《礼记》一书,荟萃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而成,文字亦极茂美。论群经文学者,多知重《左氏》,而罕及《小戴》,此皮相之论也。《左氏》所叙之事,有与《檀弓》同者,二者相较,《左氏》恒不如《檀弓》。其余论事说理之文,又何一能如《戴记》之深纯乎?不可不择若干篇熟诵之也。今更举示篇名如下:《檀弓》为记事文之极则,风韵独绝千古,须熟读。《王制》为今文学之结晶,文字亦极茂美,可熟读,既有益于学问,又有益于文学也。《文王世子》文最流畅。《礼运》、《礼器》文最古雅。《学记》、《乐记》文最深纯。《祭义》文最清丽。《坊记》、《表记》、《缙衣》三篇为一类,文极清雅。《儒行》文极茂美。《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为《仪礼》之传,文字亦极茂美。以上诸篇,皆可熟读。然非谓《戴记》文字之美者,遂尽于此,亦非谓吾所指为最美者,必能得当;更非敢强人之所好以同与我也。^[14]

吕思勉先生的见解极佳,《礼记》散文的特征,需要重新评价和认识。

二

西汉以来,对《礼记》四十六篇的成篇年代和作者就有不同的看法,如《王制》,卢植等认为是汉文帝时博士作,郑玄认为是战国末期之作《缙衣》,沈约认为是子思著作,刘驥认为是公孙尼子著作。唐宋以下,受疑古惑经思想的影响,学者已经开始怀疑《礼记》中有一些伪托之作。吕大临怀疑《儒行》非“孔子之言”;朱熹认为《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礼记》便不可深信。”^[15]“流风所煽,及至明清,怀疑《礼记》之风

②此段引文不完整,其下云:“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蚬以益微。”

愈烈。孙希旦认为《礼记》固多出汉儒,而此篇《祭法》尤驳杂不可信。^[15]又怀疑《冠义》至《聘义》六篇,皆汉人所为。近现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认为《大学》、《祭义》、《学记》、《中庸》、《礼运》等篇阐述的思想,是继承了孟子、荀子的思想,是秦汉人之作。张少康、卢永明编选的《先秦两汉文论选》把《礼记》全部放到汉代来论说,给人们造成的影响是《礼记》四十六篇都是汉人之作。

我们认为《礼记》不存在真伪问题,主要是四十六篇成篇年代的先后问题和编选者、编选时间问题。尽管自唐宋以来,学者怀疑《礼记》中一些文献是汉代人所作,或对《月令》等篇的作者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在疑古辨派盛行的1926年至1940年之间《礼记》真伪问题并不是讨论的主题。张心璜《伪书通考》中辑录的《礼记》材料,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月令》、《王制》等篇的作者是谁,一是《礼记》四十六是由谁编选而成的。这是自西汉以来,历代学者一直关注的焦点。

古文献除了辨伪之外,也需要辨真。尤其是先秦文献,因其具有多非手著、单篇流传、后学弟子整理记录等特点,所以,比较准确地确定它们的成篇年代,就显得尤为重要。郑良树先生认为,“古籍辨伪学”更名为“古籍年代学”更确切,^[16]是有道理的。

关于先秦文献的流传和特征,赵逵夫师在《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序一》中,曾有精辟的阐述。他说:

由地下出土的大量材料证明,中华民族发达很早。但是留至今日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十分有限。我们对于先秦时代存留下来的文献,要认真地对待,一定不能主观地摘出个别词语,找出某些“破绽”,随便地判为“伪作”、“拟托”,或将其时代任意拉后。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后人的东西或后人附加在早期文献上的东西一并认为是早期的。回顾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数十年中的辨伪工作,首先应该肯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经验论和实验主义的思想的引入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是以现代科学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开始。其次,将一些文献中存在的问题统统揭示出来,为以后的研究提出了课题,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古代文献的研究。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和思想的局限,方法过于简单,态度过于偏激,对

待古代文献(主要是先秦文献)就如酷吏断案,只问是否可以证明其有罪,不论可以证明其无罪的事实,因而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

对先秦古书编选机制和流传情况的认识,我们一些当代学者的认识水平不仅赶不上余嘉锡,甚至赶不上宋代的郑樵。郑樵《通志·校讎略》有《书有名亡实不亡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等,皆信而有据,近代以来已为敦煌遗书、各地出土简帛及新发现传抄纸质文献等所证明。余嘉锡《古书通例》有《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单篇别行之例》、《古书之分内外篇》及《辨附益·古书不皆手著》等,论先秦时书籍的成书及流传情况,十分明了。而有的学者只就是否见于《汉书·艺文志》及其中是否有被认为秦汉以后产生的词语或文风是否与作者其他著作相类而判真伪,看来还是对古书,尤其是先秦文献编著传播的情况欠明了。

同时我认为应该在文献学考订中废除“株连法”。一部书中有一篇是后人附益或伪造,整部书便被定为伪书;一篇文章中有几部分或几段是整理者误将其他文献编入,或传抄中误将注文、评语抄入其中(自然也不排除个别好事之徒自我作古、添加文字的可能),便将全书、全文判为伪书、伪托,这实际上是一种株连。……我们对一部书的真伪应作细致的分析,不能将多篇捆在一起,因古书多单篇流传,秦火之后汉人收集佚籍、残篇编辑成书,难免产生谬误。不仅如此,我以为有时文献的甄别还应深入到篇、段中去,看各个部分、各个段落,具体分析是否有附益或窜乱痕迹,分别作出结论。当然,这并不排除宏观上的把握。要着眼于宏观,由微观入手。^[17]

赵逵夫师对先秦文献流传特征的论述,高屋建瓴,分析透彻。《礼记》的成书就是如此。《礼记》四十六篇成篇年代有先有后,有早有晚,在流传过程中,经儒家后学、弟子整理传抄,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这并非原来的面貌。四十六篇在传抄流传中,难免会增加一些字句,或在整理时经过增加删改,或将数篇合并为一篇,或将经传合而为一,或将旁批和注文衍入正文,或将一些有关或无关的文字窜入

③所有《礼记》引文,均出自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礼记正义》,后只标页码。

正文,这是先秦文献流传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有后学有意添加的字句。如《仲尼燕居》,后学整理时,在开头加“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十六字^[18] p.1613 上]^③在结尾加“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发闾矣”十八字《孔子闲居》在开头加“孔子闲居子夏侍”七字,在末尾加“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十七字,这二十四字,上博简《民之父母》正好没有^[19]说明它们是后学为了文章的精彩动人,在整理时增加的。

2、有将其他文献中字句整段抄入者。如《郊特牲》中谈论加冠礼的一百七十八字,与《仪礼·士冠礼·记》相比,除“始冠之缁布之冠也”一句中,多前“之”字外,其他完全相同;但文句与《礼记·冠义》大异。该段简首有“冠义”二字,保存《士冠礼》之旧,肯定是抄自《士冠礼》。

3、有将两篇或数篇合为一篇者。如《乡饮酒义》是由两篇阐释“乡饮酒礼”意义的文章合并而成。其中第一篇是全文的主体,该篇比较详尽地解释了乡饮酒礼中一些礼节的意义,并引用孔子的话论说乡饮酒礼的重要性。兹举首段,其文曰:

乡饮酒之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觶,所以致稯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稯、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稯、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制之以道。^[P1682 中]

主人与宾三揖三让者,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和谦让;洗手、洗觶,再举杯饮酒,是表示洁净;拜至、拜洗等,是表示恭敬。而三揖三让等,都是乡饮酒礼中的具体礼节。其解释《仪礼·乡饮酒礼》,于此可见。

《荀子·乐论》征引《乡饮酒义》中第一篇文字。该篇自“孔子曰吾观于乡”至“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文字,全文见于《荀子·乐论》。除极个别文字外,如《乡饮酒义》中“众宾自从之”之“自”《乐论》作“皆”。其余文字全同。这当是《荀子》抄袭《乡饮酒义》。^[20]

所以《乡饮酒义》中第一篇应该成篇于《仪礼·乡饮酒礼》等篇后、《荀子》之前,即战国中晚期。

《乡饮酒义》中第二篇文字,虽然也是解释“乡饮酒礼”,但与前面文字决非一篇。一是“立宾以象天”上又有“乡饮酒之义”五字,显然是另一篇之开始。二是其虽亦解释“乡饮酒礼”,但用阴阳五行思想,与前篇定非出自一人

之手。第二篇盖秦汉人所为。将两篇合编为一篇,大概是西汉人所做。可见,当时流传的阐释古礼意义的单篇文献,是比较多的。

《文王世子》就内容而言,是由六部分组成,其中前三部分原本是三个单篇,即《文王之为世子》、《教世子》和《周公践阼》;第四、五两部分,没有篇名,但内容与教育世子密切相关;第六部分是《世子之记》。将这六部分编成目前我们看到的樣子,显然较晚。

《文王之为世子》的写作年代,大概在战国中期左右。有一天,周文王问武王说:“你做过什么梦?”武王说:“我曾梦见上帝说给我九龄。”文王说:“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呢?”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九国”指哪九个国家,自郑玄以来,未有确解。孔颖达曰:“今云西方有九国,于时未宾,则非有二分诸侯也。或以为庸、蜀、羌、微、卢、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国也。”^[P.1404 中]孔颖达所说,纯属推测。

上博简《容成氏》第四十五简提到丰、镐、于、鹿等九邦中之六邦名称,印证了武王所说,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由此可证《文王之为世子》的写作年代,大约与《容成氏》写作的年代相当,约战国中期。

《教世子》、《周公践阼》就其文气而言,类似于《周易·系辞传》、《乐记》等文字。如《周公践阼》:“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是故……然后……”或单言“是故……”的句式,也常见于《系辞传》、《乐记》,如《系辞传》上“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乐记》“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这是战国时期的常见句式。其中所言职官若小乐正、大胥、胥师等皆见于《周礼》,职掌基本相同,因此,其写作时代至迟当战国晚期。

第四部分自“庶子之正于公族者”至“亲哭之”,是该部分的经文部分,自“公族朝于内朝”至“不翦其类也”,是进一步阐释经文的传记文字。庶子的政务是管理国君的族人,用孝悌、睦友、慈爱的伦理教育他们,使他们明白父子关系的含义,长幼之间的礼节。国君的族人在处理族人事务的“内朝”朝见国君,则面向东,以北为上位,朝臣中有地位尊贵者,其朝位由庶子按照年龄辈分排列,即使贵为上卿,其位置也要排在父兄之后。如果在国君视朝的“外朝”朝见国君,就按照官位的高低由司士排列位置;在宗庙之中的朝位如同在外朝,由宗人按照爵位的高低和官位的大小安排。为什么要这样排列朝位呢?因为国君的族人在内朝朝见国君,是族人内部相亲,要尊重长幼辈分,表示父子之情重于爵位高低。在外朝朝见国君以官位大小,是表示对异姓的亲近。

宗庙之中尊崇官爵者,是表示崇敬有德者。宗人按照官位大小分派差遣,是尊重贤者。至于登堂分食祭品等,由国君嫡长子去做,这是尊祖敬宗的表现。其他各段,大致如是。

二者对比,非常明显,“传记”部分是对前面“经文”的进一步解释。庶子即《周礼·夏官》之“诸子”,又名庶子官,简称庶子,掌管国子之戒令、教治、等级、朝位等事。^[21]《礼记·燕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尚书·康诰》:“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训人。”可见,庶子之官,由来已久。因此,这一部分的经文应该写成的早一些,与《仪礼》的成书年代相当。后面阐释性的“传记”文字要晚一些,可能写成于战国晚期。

第五部分自“天子视学”至“终之以仁也”,是该部分的经文部分。自“是故圣人之记事也”至“念终始典于学”,是进一步阐释的传记文字。这部分中的经文文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周朝的养老礼,可能写成于战国中期左右。而后面解释性的“传记”文字要晚一些,约战国晚期。其中所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一句,见伪《古文尚书·说命下》:“惟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世子之记》曰:朝夕至于大寝之门外,问于内竖曰:“今日安否何如?”郑玄《注》曰:“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为世子,非礼之制。世子之礼亡,言此存其《记》。”郑玄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世子之记》只言早晚世子要向父王问安,而文王为世子时,一日早中晚都要向王问安。两相比较,《世子之记》保存了比较原始的“世子礼”,首篇《文王之为世子》可能就是根据此《记》而撰写的。因此《世子之记》可能写成于战国初期。

《文王世子》中的六小篇,均与世子礼或教育世子、公族子弟密切相关,因此,大约在战国末期,儒家弟子将这六篇编选为一篇,名曰《文王世子》,以便保存世子礼、养老礼等礼制。刘向将其归入《世子法》,原因也在此。

4、有将经、传合并为一者。如《文王世子》中第四、五部分,将经、传合并为一《大学》,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5、有旁批或注文衍入正文者。如《郊特牲》“大罗氏”一段文字,与前后文字不协,显然是错简或旁批衍入者。《燕义》首段自“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至“而进退之”,是《周礼·夏官·诸子》之文,因该篇后有“献庶子”,读《燕义》者误认为“庶子”就是“庶子官”,故加“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十一字于前,引《诸子》职文于后,后在流传中衍入正文。

6、有后人窜入的文字。如《王制》中“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以下,是汉人解释前面文字的记文,被窜入正文。《礼运》中有关“阴阳五行”的三段文字,是在流传中窜入的,与前后文字俱不协。

三

《礼记》四十九篇在流传中,尽管有以上增加、合并和舛衍的情况,甚至在一些文献中有秦汉人增加的文字,如《王制》、《乡饮酒义》等。但四十九篇主体部分,都是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后学之作。同时,不能因为《礼记》经秦汉学者传抄或整理,甚至增加部分文句,最后由汉人戴圣编选完成,就把整个《礼记》看成是汉人之作。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礼记》,秦汉学者是有功劳的。

第一,古文《记》百三十一篇等五种,在流传过程中,秦汉学者或保存,或隶定,或传抄,或整理,或增删字词,甚至改编。据文献记载,鲁恭王刘余、河间献王刘德、孔安国等人,都是古文《记》的保存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工作,为戴圣编选《礼记》,刘向整理古文《记》等,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第二,《礼记》四十九篇,由戴圣编选完成,才流传于世。《礼记》的编选,不仅是对先秦礼学文献的一次认真总结和清理,也是对儒家“礼乐”文明的宣传和宏扬,从而奠定了儒家“礼乐”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说与《礼记》没有关系。这是戴圣未曾想到的,但这恰是他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第三,《礼记》编选完成以后,戴圣弟子桥仁和马融、卢植、郑玄等经学大家,先后训诂注释,进一步扩大了《礼记》的影响。没有他们的工作,《礼记》不可能受人重视,更不可能成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乃至影响中国文化两千余年,至今兴盛不衰。

《礼记》四十九篇中,究竟哪些是秦汉学者增加或窜改的内容,除《王制》、《乡饮酒义》等个别篇章外,我们只有翘首等待考古实物的出土。《礼记》与秦汉学者的关系,大致如此。

就目前情况而言,只有根据传世文献记载,结合已经出土的文献,尽可能搞清《礼记》四十九篇的成篇年代、成篇过程和编选者、编选时间,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评价《礼记》的价值,进而探求先秦儒学的传授源流。

四

“三礼”就内容而言,各有侧重。《周礼》是通过记述三百多种职官之职掌,设想理想的政治制度。《仪礼》专门记

述冠、昏、丧、祭、射、燕、聘、觐的具体仪式,十七篇基本上是一大堆烦琐的礼节单,又多雷同。《乐记》云:“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1538]这正是《仪礼》的真实写照。

《礼记》则不同,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强的礼仪细节,关键是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极其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者深刻地认识到,在强化封建专制的同时,利用“礼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获得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故《礼记》赢得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与《论语》、《孟子》相伯仲,但超过《荀子》,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出尽了风头。清焦循曰:“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22]此言虽偏极,但说明了《礼记》逐渐走红的原因。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和谐社会,是当代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礼记》作为儒家思想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可借鉴的地方很多。具体说《礼记》研究的意义有五个方面:

1、先秦儒家自孔子到孟子之间的学术传承,一直不很清楚。《礼记》既然是先秦儒家讨论礼学的论文和讲授笔记的汇集,若能搞清四十九篇的作者或成篇年代,则可基本解决孔孟之间学术的传承。这是学术史上一个关键的问题。

2、通过《礼记》研究,我们可以比较详尽地了解先秦时期人们的冠婚、燕飧、朝聘、丧葬、祭祀等礼仪,即他们如何举行成人礼和婚礼,他们在吃什么,怎么吃,什么食物有益于身体健康,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宴饮聚会时如何行礼,婚丧嫁娶怎么进行,祭祀天地祖先的缘由等等,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画卷,对现代社会生活多有启迪,从中可借鉴者很多。

3、了解先秦儒家在“礼崩乐坏”时在想什么?如何治国?为什么要恢复事事有礼、有制的秩序?这些是历代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当代学人苦思和关注的问题。先秦儒家学者所想所为,对我们究竟有何意义?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如何自强自立?在与西方文明相互交流过程中,对我们祖先的“礼乐”

文化,是否需要继承?如果需要,如何继承?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4、了解先秦儒家是怎样“修身养性”、接人待物,怎样学习、生活,为什么他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缘由何在?不同时代,人生的意义和人的价值该如何体现?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该如何共处?先秦儒家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和以法治国的当代社会,我们怎样才有更加幸福的精神生活?道德、思想乃至观念的真空,用什么来填充?我们只有在《礼记》等传统经典中寻找部分答案,否则,中国特色、从国情出发,从何谈起?

5、基本搞清现代生活习俗中如婚丧、娱乐、祭祀、服饰等礼节及存在于现代人们头脑中一些思想观念的源头,从而正确评价古代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并从中汲取营养,以便建设美好的和谐社会。

《礼记》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代表作,如何看待《礼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对待中华“礼乐”文明。自戴东原以降,尤其是“五四”以来,“吃人的礼教”观念,深入人心,至今谈“礼”,或提到《礼记》,在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是“封建”、“落后”甚至是“顽固”、“迂腐”的表现。连带所及,研究古代典籍者,亦被称为“腐儒”。然而,被称为“腐儒”者,经历史的冲洗,不但没有“腐而朽烂”,反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熠熠生辉。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华民族之魂靠他们来传承、弘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大讨论”热潮后,从思想文化角度及文史哲等各个领域,逐渐重视传统经典《周礼》、《仪礼》、《礼记》等经典也在重视之列。但这种重视,只限于学术界与先秦两汉有关的个别专业,仅是起步而已。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公布《礼记》一书,又受到学术界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引起人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儒家“礼乐”文明,特别是儒家“礼乐”文明与现实的关系。正如龚建平所说:

在传统哲学占主流话语地位的儒学中,最具中国特色而又最不能适应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恐怕要数“礼”的思想。但是,“礼”又可说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渗透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及制度体系,离开了它,我们又如何来解读传统呢?^[23]

在哲学、政治与伦理的互动中,礼是一个枢纽。因而,脱离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符号的礼这一历史前提,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就有面临某种可

能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礼及礼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可回避的内容,而且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24]

要研究传统的“礼”,《礼记》的地位十分显赫,甚至在《周礼》和《仪礼》之上。《礼记》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其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并代代相传。细读《礼记》中《曲礼》、《学记》、《乐记》、《内则》、《王制》、《礼运》等篇,自能体会一二。

当今社会,每当人们谈论人际关系和精神、物质生活时,恐怕最头痛的事,是怕碰到“不讲理”的人和事。什么叫“讲理”?我们认为,只有“合礼”,才算讲理。怎样是“合礼”?在《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P.2458]即行礼要恰到好处,才可贵,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但为恰当而恰当,不用礼加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曲礼》上说:“礼从宜。”礼不妄说人。^{[P.1230] [P.1231]}是一样的道理。

先秦儒家制定“礼”的原则是什么?《礼器》说:“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P.1430]此谓忠信是礼内在的实质,得理合宜是礼外在的形式。没有忠信,礼不能成立;不合理适宜,礼则无法实行。“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P.1431]先王制定礼,首先考虑是否符合时代环境,其次才依次考虑是否顺乎人伦、分辨祭祀的主体、注意事理之宜、礼与人之身份是否相称等。礼的这种内涵,至今光辉灿烂。

战国楚简的出土,引发我们对《礼记》研究的深思,尤其是四十六篇成篇年代等问题,需要重新定位、认识和评价。所以,只有对《礼记》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知道从《礼记》中汲取哪些营养,更好地让传统“礼乐”文明现代化,以便建设现代社会的礼仪文明和规范。《礼记》研究的意义,主要在此。

参考文献:

- [1]《中国哲学》编辑部.郭店楚简研究[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 [2]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3]朱渊青,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4]朱渊青,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C].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 [5]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6]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7]王锴.三礼研究论著提要[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 [8]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9]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说明[A].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8.
-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12.
- [12]张少康,卢永麟.先秦两汉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55.
- [13]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4]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58.
- [15]吕思勉.经子解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13.
- [16]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5:1398.
- [17]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 [18]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13上.
- [20]马承源.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2]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23]焦循.礼记补疏序[A].清经解清经解续编[J].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8778.
- [24]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

作者简介:王锴(1965-),男,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献学和“三礼”的研究。